

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1}

叶中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摘要】: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表达方式。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从四马路向大马路的拓展,不仅演示了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近代化过程,亦表明了资本主义经营的一种空间策略——即它在生产实体性消费空间的同时,也在生产相应的文化心理空间。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在为市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之外,还承载着开展社会交往、传递近现代意识、融通中西文化、结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文化消费空间;城市社会;空间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6)04-0018-08

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表达方式。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存在——从积极方面看——在为城市积累财富,为市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之外,也承载着开展社交、整合信息、传递近现代意识的重要功能。一般市民正是通过对这一空间的参与,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真切地体验到了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因此,对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进行溯源和解读,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

一、从宝善街到四马路:近代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

上海自1843年开埠并设立了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后,英殖民主义者构屋筑路的范围由外滩一线西扩至界路(今河南中路)。自1851年起,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五马路(今广东路)相继建成。由是,以近代交通干道为纬的市民文化消费空间,也被渐次构筑起来。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若由洋泾浜弃舟登租界,首先踏进的是被称为夷场“华人街”的宝善街(今广东路上自河南路西至福建路东一段),沿街设有栈房、戏园、茶楼、酒肆、妓院、赌窟等,都是些纯“老中国”式的休闲娱乐场所,但四马路的崛起,很快取代了宝善街的位置。在1876年,还有人称“沪上热闹之区独称宝善街为巨擘”。但至1883年,时人已称“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①。这条东自外滩西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的通衢大路,成了当时上海市民文化消费景观的一个缩影。

这时期最能代表四马路文化消费特征的,依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休闲场所——茶楼。沿四马路由西向东,著名的大茶楼有

¹收稿日期:2006-05-11

作者简介:叶中强(1953-),男,浙江定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群芳花萼楼、四海心平楼、金波玉泉楼、碧露春、乾元品春楼、西园、三万昌、仪园、顺风楼、留园、四海升平楼、青莲阁、五层楼、万华楼、沪江第一楼、乐也逍遥楼等。但同传统茶馆相比，这些茶楼无论在规模和功能上已现出别样的姿态。如其中号称沪上“第一”的青莲阁（今外文书店旧址），上下共三层，除设茶座外，还兼营戏园、烟间、弹子房，并兼售西点、花卉、虫鸟，光顾者可随意听唱、游艺、购物、唤妓或临街观景，这使得茶楼这一典型“乡村中国”式的休闲场所，呈现出向综合性消费模式的近代游艺场方向发展的新气象。

其次是传统餐饮业结构的变化。据徐珂的《清稗类钞·西餐》记载：“我国之设肆西餐，始于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当时的四马路上西餐馆林立，“如海天春、富贵春、三台阁、普天香、海国春、海国春新号、一家春、岭南楼、一枝香、金谷香、四海村、玉楼春、浦南春、旅泰等，计十四五家……独一品香最早。”^②那时租界里的华人，视吃西餐为时髦，赶潮似地涌进四马路上的“番菜馆”。由于不谙吃西餐的规矩，常会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如近代作家朱瘦菊（海上说梦人）的《歌浦潮》第十三回，就描写了当时一群中国士绅喝白兰地、使刀叉时大闹笑话的情景，故事发生的地点即是四马路上有名的“一枝香”。当时西餐的价格，一般为每客大洋1元。但依据消费对象不同，价格仍有贵贱之分。如近代著名作家包天笑和毕依虹，曾结伴“闯过”黄浦滩上一家“标有外国名字”，在当时上海算是最贵的西菜馆，价为10元一客；亦去“试过”四马路胡家宅一家日本人开的西菜馆，价仅5角一客。^③这些西餐馆的外观仍是中国传统的茶楼式建筑，馆内则是琉璃吊灯、西式壁炉、古瓷盆景等一派亦中亦西的富丽陈设。由此可见，在四马路的“吃文化”中，华洋并存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再次是传统戏院的变化。当时的戏院多以“茶园”命名，辛亥前后，在现黄浦区境内共有40余座以演戏为主业的“茶园”，其中有一半坐落于四马路及其两翼。“戏园虽然还是一派中国情调，可以边喝茶边嗑瓜子边听戏，手巾把满场飞，两旁却有了两层的包厢”^④，舞台照明则已使用纱罩煤油汽灯。并且，受西风之影响，坤伶也开始在舞台上抛头露面。1876年，名妓朱素兰得工部局批准，在四马路创办了女书场“也是楼”，入场门资（含茶资）为大洋1元。开场前女唱书（擅长弹词的妓女）们集体合唱一曲作为开篇，客人可以点曲，每点一曲收大洋1元。由于女书场的收入超过了普通妓院的收入，一时女书场成批涌现，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楼、天乐窝、小广寒等共12家都在四马路。这些女书场成为后来男女同台演出的先声。

毋须回避的是，在四马路的消费结构中，妓业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853年上海县城内爆发小刀会起义，原来集中在城内西门一带的妓院，纷纷搬迁至租界。1861年，太平军占领江南一带，并实行禁娼，南京、扬州、苏州等地的妓女纷纷避居上海租界，遂形成“女闻之盛甲于天下”的风化现象。当时上海的高等妓院主要集中在四马路一带，这些曲院深巷聚纳着各地各色妓女，成为清末民初达官巨贾、文人骚客的主要冶游之地，亦成为近代文人观察世风的窗口和结构文学文本的“空间要素”。如在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四马路一带的尚仁里、荟芳里、合兴里、公阳里等花街柳巷，是小说人物活动的基本场所。这些青楼曲院和四马路上比肩而立的茶楼、酒肆、梨园、客栈、商号、书店以及大规模涌现的近代出版机构一起，构成了处于近代化过程中的上海独特鲜活，又不免有些暧昧的市民文化消费空间。

二、张园：休闲娱乐与“公共领域”同构

以四马路为起点，循着当时一条典型的游览路线——即经第二跑马场到静安寺，其间可到晚清上海最大的公共休闲娱乐场所——张园（约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泰兴路之间）。

张园本为西人格农的别墅。1882年，园地被无锡人张叔和购得，更名味莼园，又名张园。张园于1885年正式对外开放。园中荟集苏州庭院、西式别墅、石库门等中西样式建筑。其中的安垲第大洋楼，是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楼内可容千人，布置均仿西式，时有交谊舞会在内举行。园区内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戏院、会堂、商场、照相馆、抛球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空间于一体，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化消费场所。张园的出现，成了当时西方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登陆上海的桥头堡。据说，新学大家严复对张园里的一些西式“奇技淫巧”也深感兴趣，他在沪时，是出入张园的常客，人在外地时，则常写信托人去张园买这买那。1886年10月6日，张园试燃电灯，游客争相围睹，视之为“天灯”。^⑤

原为休闲娱乐场所的张园，在近代上海逐渐演化为市民参与国家事务的“公共领域”。张园之为“公共领域”，在于它所承载的特殊社会、政治、文化功能：

一是它的开放性。张园是当时上海惟一家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的大型公共花园。与当时专为西人辟设的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以及受文人、豪客、妓女等少数阶层青睐的徐园、愚园等园林相比，张园的大众性特征和公共性程度无疑是最高的：政客商人在此集会交易、文人墨客在此雅集品题、普通市民在此喝茶游艺、外埠游客在此赏花观景、青楼女子在此高张艳帜、小报记者在此窥艳猎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均可出入其间。

二是它的参与性。这里所说的参与性，主要是指民众对国家政治或公共事务的参与。张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作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清末寓沪革命党人曾多次在此聚会，宣传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功成，孙中山回国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即在此发表演说；宋教仁被刺，南社社员假张园开会追悼；某年江淮遇灾，上海绅商乃在张园组织“赛珍会”，以义卖所得供作赈灾。^⑥当时的张园，犹如伦敦的海德公园，“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不用说，张园准有集会。”^⑦由是，张园从一个大众性的休闲娱乐场所，演化为类似于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政治性“公共领域”。

但上海的近代化过程毕竟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这种“外力”给上海带来自由空间的同时，并没有造就一个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公民社会。像张园这种类似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公共领域”，缺乏其内在的驱动力和持久的支撑力。随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退潮，张园的政治性内涵，立即被城市社会一个更为强大、更为本质的主题——市场与消费——所消解。1909年后，随着在资本运作、经营手段、地理位置和内容形式上更胜一筹的新世界、大世界等新型游乐场的崛起，张园连同它的集会政治便日趋衰落。

三、空间的变异：西方娱乐方式及其娱乐精神的输入

现代文学学者吴福辉在分析以四马路为主体的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时认为：四马路时代的消费文化特点，仅仅是传统消费方式转向现代消费方式之始，其新的品格极其微弱：第一，它与现代金融、商业是分离的。第二，旧的娱乐仍占主位。第三，还是纯享乐的文化。因此，四马路的文化尽管加进了一些舶来成分，其实质不过是中国固有封建娱乐方式的多样化。^⑧

但传统的文化消费空间正在悄悄地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上海开埠后，西方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也被带进了租界。虽然一些娱乐项目及其场所在初始专为西人所设，但由于租界华洋杂居的现实，使得一些中国居民也能参与其中，有些娱乐形式还渐次渗入民间，成为中国市民休闲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最早吸引中国市民兴趣并参与的，是西人的赛马活动。1850年，麟瑞洋行大班，英国人霍格等五人发起组织上海跑马总会，以极低廉的价格购进花园弄（今南京东路）以北界路（今河南中路）间的80亩土地，辟筑成第一个跑马场。1854年，跑马总会乘地价飞涨之际，将第一个跑马场以高价售出，又以低价购进今湖北路、北海路、西藏中路（旧名泥城浜）、芝罘路间的170亩土地建成新的跑马场，旧称第二跑马场（跑马总会后在今人民广场西端重建第三跑马场）。1851年，跑马总会举行了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正规的赛马活动。自此，每年春秋两季的赛马活动，成为上海租界的一项例行活动。

赛马一般连续举行3天，届时“西人咸往观焉，为之罢市数日”^⑨。由于这一赛事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刺激性，又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进行，所以也引起了本地民众的极大兴趣。每逢西人赛马，中国居民也无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纷纷前往观看。1875年5月3日举行的一次赛马会，《申报》有文记述其盛：“观者蜂屯蚁聚，一时手舞足蹈，齐声呼喊，以助马势。即跑马楼及花园内之西人，亦各登楼，以千里镜注视。”^⑩也有文描述往观者社会身份的：“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立足处。”^⑪有资料证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著名文人也加入了这一市民的狂欢活动，如1858年11月11日，王韬在日记中记载：“梁阁斋同杨见山来访，壬叔（李善兰）约往环马场，观西人驰马，杨、梁先往，予饭罢始去。”^⑫民国时期的著名通俗文学作家赵苕狂则是一个赛马迷，他在主《四民报》、《红玫瑰》、《游戏世界》等杂志笔政时，“喜购跑马票，每逢春

秋赛马，必与其盛，以博胜负，因此就职诸出版机构，必先约定，赛马时期，例须给假。”^⑨由此可见，西人每年的赛马会，已成为广受上海各阶层市民欢迎的一项休闲娱乐活动。

除赛马外，西人带来的洋戏、幻灯、影戏、杂技、马戏、弹子等，也渐次进入传统的文化消费空间。当时一些著名的大茶楼或餐馆，如一品香、华众会(青莲阁之前身)、阊苑第一楼等都开设了弹子房。1874年，英国魔术师瓦纳来沪演出，由于运用了不少新奇的声光化电技术，令观看者兴奋不已：“座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抚掌笑声，振聋人耳。”^⑩作为电影的前身——幻灯，也引起了广泛兴趣。租界内的四美园、丹桂园，及华界内的同文馆等处，都曾放映过这种被称为“玻璃洋画”的幻灯艺术。早期的无声电影也接踵而至。自1896年徐园(今天潼路814弄)内的“又一村”首映“西洋影戏”后，1897年7月，美国人雍松带着《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西班牙跳舞》等纪录片，先后在福州路的天华茶园、西藏路附近的奇园、广东路的同庆茶园等处巡回放映。

西方娱乐形式向传统文化消费空间的渗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休闲娱乐方式的变异，也引起了传统休闲娱乐理念的更新。如赛马一项，刚在上海出现时，一些围观的富人还会嘲笑洋人不懂享受，不知“闲才是福”的道理。但赛马场上激烈的气氛，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一种竞争意识，仍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至于其他一些西方娱乐方式，由于捎带着先进的声光化电技术、新异的游戏规则，在给人们带来新奇感的同时，也开阔着人们的眼界、增长着人们的知识、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由此，传统的仅以满足口腹等生理之需或单纯休憩的传统休闲理念，开始向健体、益智、增知、怡情、养性等综合方向转变。

四、“现代性”体验: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空间策略

渐渐地，也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10至30年代。随着上海现代贸易、航运、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是一种建立在现代资本运作及其市场经营手段之上的，综合性、规模化的休闲娱乐场所的出现。1915年和1917年，号称“上海第一游艺场”的新世界(今南京路西藏路口)和号称“中国第一俱乐部”的大世界(今延安东路西藏路口)相继落成开张。其中大世界的总面积为14000多平方米，是以组建公司的形式，并完全通过市场化的筹融资手段建成。游艺场中设有溜冰场、弹子房、电影院、戏院、展馆、露天花园、茶室、中西餐厅等多种游艺、休闲空间。多个戏院中可同时或轮番上演京戏、昆曲、苏滩、甬滩、说书、文明戏、北方大鼓、三弦拉戏和由西人表演的魔术、杂技等。大世界里放映的电影，则是专从美国进口的惊险格斗片。这种百艺杂陈的综合性娱乐空间，把民间性和大众性有效地融为一体；把中西、古今、雅俗不同的文化形态紧密地浓缩于一地，在人与空间的不断转换中，多种文化形式被匆匆而又广泛地吸纳，遂为上海民众打开了一个博览式、开放性的文化橱窗。再从进场人物看，由于两个游艺场的定位均是大众，门票都仅为小洋2角，因而，出入其间的除大小商人、文人墨客、外地游客外，更多的则是收入处于中下水平的本地平民。据资料统计，当时大世界的日均门票销售在2万余张左右。^⑪

从四马路上的青莲阁、一品香到大马路上的新世界及其附近的大世界，表明一种源自西方，建筑在近代资本运作之上的，规模化、综合性的市民休闲娱乐形式，已被成功地进行了本土化的移植。在此过程中，西方所谓“娱乐民主化”的理念，也经由文化消费空间得到了一种实质性的传递。

如果说，“新世界”和“大世界”这种来自西方的大众休闲娱乐形式在上海的定型，被濡染上了中国乡村大型庙会的文化色彩，那么，一种与近代大工业、大商业紧密结合的复合型消费空间——“百货公司”，及其他一些经济、文化底蕴相似的休闲娱乐设施的出现，则把人们的文化经验引向了一种全新的，关于“现代性”的体验。在中国近现代商业中枢——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率先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型百货零售业与休闲娱乐业组合，开创了一种集现代购物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消费空间。通过不同功能空间之间的组接或交叉，“百货公司”把对现代物质的体验与社交功利、休养愉悦熔于一炉。先施公司屋顶花园里的饭店、酒吧、咖啡馆，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社、天韵楼游乐场，大新公司五楼的交谊舞厅，与商场内的BVD内衣、HOBIGANT香水、FLORSHEIM鞋、康克令水笔，及照相机、留声机、自动汽炉这些现代产品，以

及象征着现代科技进步的自动电梯、冷暖空调等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丰裕、精致、新潮的消费环境和自足性的生活社区，使消费者恍若置身于一个与屋外普通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确信踏上了商场内的自动电梯，也就攀上了通向“现代”的阶梯。资本主义经营的空间策略，在生产实体空间的同时，也在生产与此相应的文化心理空间。

事实上，至20世纪30年代，这种强调现代物性体验的空间策略，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新兴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1932年开办的百乐门舞厅，以当时国际最流行的美国阿黛可(artdeco)建筑风格、考究的巴洛克式内部装潢和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弹簧地板”、“玻璃舞池”，成为当时男女“社交公开化”的重要载体。1933年，耗资百万金，配有美国RCA最新实音式有声电影放映机和最先进的冷气设施，容纳2000个沙发座的大光明电影院落成。大光明以及奥登、卡尔登、恩派亚、夏令配克、中央、维多利亚、巴黎、上海、美琪、兰心等这些设施先进、风格各异的影戏院，成了当时上海“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⑥。

大型百货公司、大型游艺场、现代影戏院、回力球场、跑马厅、跑狗场、舞厅，以及散落在大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静安寺路等各个主要街区的咖啡馆、酒吧，与霓虹灯闪烁的橱窗、街景，奔驰在大街上的新款劳司莱斯汽车，构成了一种与四马路文化迥异的现代都市文化景观。在当时的新感觉派文艺刊物《新文艺》上，曾登载过一篇署名迷云，题为《现代人底娱乐姿态》的文章，以饱胀着热情的辞色，对这种文化形态进行了礼赞：

娱乐，这个写在过去的历史中不知道受过几许世间的白眼和凌辱——好一个有决断力的，大胆的，幽秘着魔术似的，并且包满着肉底表现呀！

半世纪以前连影子都未曾出现过的新时代的产物——银幕，汽车，飞机，单纯而雅致的圆形与直线所构成的机械，把文艺复兴时代底古梦完全打破了的分离派底建筑物，asphalt的道路，加之以彻底的人工所建造的街道，甚至昼夜无别的延长！……我们所追求着的无非是流向快乐之途上的汹涌奔腾之潮和活现现地呼吸着的现代，… …^⑦

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四马路消费文化中的“京式盆汤澡罢身，杏花楼畔又逡巡。贪看一出髦儿戏，也算风流队里人”¹⁸的澡后看戏；“洞庭春色佐春茶，饮罢徐徐上小车。听说客从何处去，西金街内访桃花”^⑧的茶罢嫖妓；“万里云烟远近夸，冷笼陈土小壶茶。横陈短榻组里，更有何人肯忆家”^⑨的烟馆寻乐。就可以发觉，产生在20世纪10至30年代上海的休闲娱乐方式，无论在“形、筋、骨”或“精、气、神”诸方面，已与传统有了质的差别。现代休闲娱乐方式虽“不脱奢靡、麻醉的负面作用，却饱胀了热情，有种生命欢欣、跃动的气息”^⑩。

至此，一种以现代大工业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其结构底蕴，以资本运作和市场消费为其发动引擎的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在都市上海正式形成。

五、城市、时间与入：市民文化消费空间形成的原因及其社会功能

（一）城市：贸易中心的崛起与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

人们在谋生劳作之余，还需要休闲娱乐。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人与土地的关系非常密切，地域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的程度很低。因此，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及其休闲娱乐活动，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日常的休闲活动，就其范围而言，一般多以家庭、族亲、邻里为轴心进行，只是在农闲或年节时，才会有村社之间的公共性娱乐活动。就其形式而言，是建基于普遍匮乏的小农生活及其习俗之上的喝茶、聊天、宴客，或迎神、观戏等。就其功能而言，是以休憩和延续习俗为主要价值取向。因此，在中国乡村，很少有常设性、规模化的文化消费场所，只是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镇，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固定性的茶馆、酒楼、妓院等，以满足本地居民及往来客商的休憩、享乐之需。

上海开埠前，只是个偏远的小县城，其繁华程度远不及苏、杭，文化消费场所自不足观。但自开埠通商后，中外商旅往来大幅度增加，自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城市和“远东第一大码头”，其经济功能远远超过了它的政治功能。这在通常以政治要素建市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近代上海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大城市的功能意义。

中外贸易活动的大增，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也导致了休闲娱乐活动范围、功能的变异。首先，就范围而言，人们的日常休闲活动，已不再局限于家庭、邻里、村社，而是更加社会化、市场化，由此，大量常设性的文化消费场所应运而生。其次，就功能而言，这些消费场所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休憩、享乐之需，而是将休闲娱乐与社交功利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晚清上海，中高档的酒楼、餐馆里，大多是些请客会友的饭局。茶馆亦不再是单纯解渴消闲之处：“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①。戏馆亦成了交易应酬之地：“沪上为众商聚会之所，凡举会请客者咸邀入戏馆，利其便也”^②。烟馆亦不再仅是解瘾之所，上海的一些高档烟馆“华其居，丽其设，精其器，工其烟，是以海内文人商贾，无不闻其名，仰其景，偶一至沪，甫停骖即往一爽素志。故是设不但便行人之瘾，……是以文人巨贾或论诗文，或谈交易，是借烟以畅叙幽情也”^③。由是，这些消费空间在供人消遣娱乐的同时，也在促进市场交换、加速信息流通、聚纳八方来客和结构新的社会关系。

（二）时间：劳动与闲暇的分离及休闲时间的延长

在以往小农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投入，休闲娱乐在这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中，往往被认为是奢靡，是被正统伦理排斥在中心之外的。有限的休闲娱乐活动则严格地受制于节气、昼夜等自然条件。但城市大商业和大工业的组织方式，则对人们的休闲生活产生了另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是，商业活动及市场谋生方式，不再把人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遂产生了较多的可支配时间。人们的收入，也大多不再与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投入发生必然的关系，这使得休闲娱乐活动有可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改变了人们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作息时间受制于节气的混沌状态，使劳动和闲暇的时间区分更加明晰化、固定化，如工作定时和礼拜天休息等。此外，城市化过程中的市政建设、能源利用，也直接影响了人们休闲娱乐活动的时间分配，如街灯的设置、煤气灯及后来电灯的普及，使城市生活不再受昼夜的约束。而马路的开辟、交通工具的改善，则使人们的休闲活动较少受距离的限制，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④

这种时间分配上的“合理化”过程，对开埠后的上海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白天从事各行各业，傍晚或周末便涌向各种休闲娱乐场所，由此造成了夜生活的繁荣和礼拜天休闲的习俗。当时有许多诗文记载了此种情景，如有记市民逢礼拜时喜悦心情的：“第一开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园”^⑤、“恰逢礼拜闲无事，好把京班仔细看”^⑥；有记夜生活繁荣景象的：“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⑦。由此可见，夜生活和周末休闲，已成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

（三）人：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文化选择

上海开埠以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原先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宗法社会被留在了城外，一个以市场交换为生存法则的市民社会迅速地崛起，并深深地影响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选择。据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关于公共租界内的职业分类统计：由6521人组成的职业人群中，中外各业商人共2570人，其他职业人群则主要由洋行雇员、航运人员、警员、工程师、机械师、裁缝、理发师、工人、佣人、苦力等组成。这些依据新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人群，在上海构成了一个中西杂居，以市场交换为生的近代市民社会。在日常文化选择上，他们更多地是依据市民社会的生活逻辑（如视日常休闲享乐为正当，具有道德合法性），选择适合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正是由于这一消费群体及其精神需求的存在，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是富商豪绅在各种休闲娱乐场所一掷千金，一般收入不多的普通市民，也在工余寻找休闲娱乐。时有文记：“身非富人，依人作嫁，或为商伙，或为馆师，则碌碌终朝，当夕阳西匿，暝色未昏，亦将行此数者，以适一时之意，以解一日之烦”^⑧。这说明：原先只为中上阶层拥有的休闲娱乐活动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行为。休闲

娱乐生活的大众化、日常化、消费化，这是上海城市生活趋于近代转型的一个标志。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是商品经济、城市社会发展的伴生物；是建筑在近现代物质生产与消费之上的文化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物质形貌和文化底色。

注释：

① ⑪参见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9页。

②见《上海著名之商场·一品香》，载《图画日报》第10号，第7页。

③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18页。

④⑧ ⑫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17页。

⑤⑦参见熊月之：《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4日。

⑥ ⑬参见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59页。

⑨《驰马角胜》，载《申报》1972年4月30日。

⑩《跑马类记》，载《申报》1875年5月5日。

⑫《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页。

⑭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70～5071页。

⑮参见崔雪芹：《谁为商业奇才黄楚九立传》，载www.ccant.com.cn，2004年6月。

⑯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⑰迷云：《现代人底娱乐姿态》，载《新文艺》（一卷）第6号。

⑱⑲⑳慈湖小隐：《续沪北竹枝词》，载《申报》1872年8月12日。

㉑池志澂：《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㉒华友来稿：《劝演正戏说》，载《上海新报》1872年2月17日。

㉓无事未闲居主识：《烟馆说》，载《申报》1872年6月15日。

㉔参见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⑳ 鸳湖隐名氏：《洋场竹枝词》，载《申报》1872 年7 月12 日。

㉑ 苕溪洛如花馆主人未定草：《春申浦竹枝词》，载《申报》1874 年10 月17 日。

㉒ 晟溪养浩主人稿：《戏园竹枝词》，《申报》1872 年7 月9 日。

㉓ ㉔ 《上海乐事解》，《申报》1877 年10 月13 日。